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

中期成果

《世纪之交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及其发展趋势》

冷战后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 及其对我之影响

(内部研究报告 请勿外传转载)

郝 时 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94年12月1日·北京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

中期成果

《世纪之交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及其发展趋势》

冷战后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 及其对我之影响

(内部研究报告 请勿外传转载)

郝 时 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94 年 12 月 1 日·北京

引 言

民族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永世长存。

民族现象遵循形成、发展、融合和消亡的规律而终结，对这一规律我们称之为民族过程。

20 世纪是人类社会民族过程最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世界各个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形成阶段之后，趋向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对国家形式的依托，先后步入民族过程的第二阶段，即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伴随着世界帝国的衰亡、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全球性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发生的。

“城邦国家”曾是世界古代历史的主角，而“民族国家”则是世界近代历史的代表。但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多民族国家”日益增多的趋势，使人类社会现代历史的多民族国家结构形成了现实基础和必然趋势。

多民族国家的增多，一方面是一些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域的紧密联系、经济文化的交往需要与相互依存、生态生存环境变化引起的迁徙和移民等社会因素造就的历史基础所使然；另一方面则由于帝国的扩张、列强的分割、国家的兴衰、纷繁的战乱等政治因素造成的现实基础所构建。但是，无论如何，多民族国家全球化的趋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国家结构特点。

二战以后，东西方的冷战对抗，使和平问题日益突出；南北方的经济差距，使发展矛盾日益尖锐；和平与发展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时代主题。超级大国左右世界形势的作用，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冲击下不断削弱；二战后大国构建的雅尔塔体制，在发展中国家

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争取平等发展的斗争中趋向瓦解。南南合作，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的淡化，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之间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使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集团化和一体化趋势日益显著。世界正在变小，民族界限和国家界限在不断扩大的经济文化交往中趋于淡薄。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下，冷战结束后后泛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却对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和趋向于淡化的民族界限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要求实行民族自决，建立“纯而又纯”的民族国家“热望”，正在使世界上的国家增多，正在使民族矛盾普遍加剧。

20 世纪的人类社会民族过程出现过三次重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即一战前后、二战前后和冷战前后的世界民族主义运动。不难看出，这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发生，都是以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和国际社会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为背景的，而且其互动关系也十分明显。冷战格局的消失，是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剧变为标志的。在这一过程中，民族矛盾引发社会动乱、加剧政治演变、挑起族际冲突、造成国家分裂的破坏性作用，十分重大。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也由此发端。

源起于前苏联和东欧剧变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浪潮，在席卷前苏东地区之后，又向西欧发展，并以其传染性的狂热向世界各地蔓延，无形中成为填补冷战格局瓦解后势力“真空”的一股强大思潮。在其影响下，很多地区和国家固有的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明显加剧。经久不息的民族战争，日趋严重的宗教冲突，纷繁复杂的领土争端，汹涌不止的难民浪潮，重新复苏的种族排外，日益增多的地方分离，都在这股浪潮的冲击和推动下显著发展。国际社会中的民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已成为发展国家关系和构建世界新秩序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冷战结束前后泛起的这股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不仅成为国际社会政治论坛和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也成为人们预测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走向和新世纪特点不可避免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逆转，使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蒙受了重大挫折，这似乎印证了西方势力津津乐道的“历史终结”和“大失败”断言；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国家的解体与分裂，是以民族矛盾在社会演变中的作用为基础的，这又促使西方预言家作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终将步其后尘的判断。然而，在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西方世界和众多资本主义多民族、多种族国家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宗教纠纷、分离运动却日趋严重，这当然是那些宣扬上述断言和作出上述判断的西方人士始料不及的。毫无疑问，前苏联和东欧地区至今仍是民族主义的裂变场，民族分离、国家分化的过程尚未终止。但是，民族主义浪潮的蔓延所引发的更为广泛的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又使那种试图简单用意识形态分野来评判这一现象的断言难以自圆。

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的广泛兴起及其引起的国家格局变化，无疑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在前苏东地区十分明显。但是，它超越意识形态对立所表现出的普遍性，却更突出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处理和解决民族矛盾方面具有共性的弊端。任何多民族或多种族的国家，不论其实行何种社会制度，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和种族问题，必然将陷入反映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的社会问题困扰，甚至是危及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裂变。

从一战、二战前后的两次民族主义浪潮的表象特征和形式看，国家数量的增多是一个共性特点。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的现实表现也在反映着类似特点，这是否意味着在世纪之交的年代或新世纪的一定阶段世界国家格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一些预言家提出的几百

乃至上千国家的世界国家格局真得会出现吗?在研究民族主义浪潮这一跨世纪现象时,我们不仅需要考虑这些问题,而且更需要从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大背景下来探讨民族主义浪潮的两重性和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当前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汹涌的国际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有多大、有多深,并不取决于西方敌对势力的预言和图谋“分化”的战略,而取决于我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实际成效。内因是变化的依据,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内部的问题解决好,我们就具备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牢固基础和有效抵制外来消极影响的能力。

应当看到,世纪之交世界民族问题的特点,虽然表现为矛盾、冲突和分离的走向;但是,它的深层内涵又预示着人类社会在进入新世纪的过程中,正面临着科学认识民族过程的发展规律和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抉择。在这一选择中,成功的理论与实践必然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借鉴。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将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进程,对世界民族过程产生积极的影响。

引 言

民族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永世长存。

民族现象遵循形成、发展、融合和消亡的规律而终结，对这一规律我们称之为民族过程。

20 世纪是人类社会民族过程最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世界各个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形成阶段之后，趋向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对国家形式的依托，先后步入民族过程的第二阶段，即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伴随着世界帝国的衰亡、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全球性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发生的。

“城邦国家”曾是世界古代历史的主角，而“民族国家”则是世界近代历史的代表。但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多民族国家”日益增多的趋势，使人类社会现代历史的多民族国家结构形成了现实基础和必然趋势。

多民族国家的增多，一方面是一些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域的紧密联系、经济文化的交往需要与相互依存、生态生存环境变化引起的迁徙和移民等社会因素造就的历史基础所使然；另一方面则由于帝国的扩张、列强的分割、国家的兴衰、纷繁的战乱等政治因素造成的现实基础所构建。但是，无论如何，多民族国家全球化的趋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国家结构特点。

二战以后，东西方的冷战对抗，使和平问题日益突出；南北方的经济差距，使发展矛盾日益尖锐；和平与发展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时代主题。超级大国左右世界形势的作用，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冲击下不断削弱；二战后大国构建的雅尔塔体制，在发展中国家

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争取平等发展的斗争中趋向瓦解。南南合作，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的淡化，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之间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使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集团化和一体化趋势日益显著。世界正在变小，民族界限和国家界限在不断扩大的经济文化交往中趋于淡薄。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下，冷战结束后后泛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却对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和趋向于淡化的民族界限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要求实行民族自决，建立“纯而又纯”的民族国家“热望”，正在使世界上的国家增多，正在使民族矛盾普遍加剧。

20 世纪的人类社会民族过程出现过三次重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即一战前后、二战前后和冷战前后的世界民族主义运动。不难看出，这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发生，都是以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和国际社会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为背景的，而且其互动关系也十分明显。冷战格局的消失，是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剧变为标志的。在这一过程中，民族矛盾引发社会动乱、加剧政治演变、挑起族际冲突、造成国家分裂的破坏性作用，十分重大。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也由此发端。

源起于前苏联和东欧剧变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浪潮，在席卷前苏东地区之后，又向西欧发展，并以其传染性的狂热向世界各地蔓延，无形中成为填补冷战格局瓦解后势力“真空”的一股强大思潮。在其影响下，很多地区和国家固有的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明显加剧。经久不息的民族战争，日趋严重的宗教冲突，纷繁复杂的领土争端，汹涌不止的难民浪潮，重新复苏的种族排外，日益增多的地方分离，都在这股浪潮的冲击和推动下显著发展。国际社会中的民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已成为发展国家关系和构建世界新秩序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冷战结束前后泛起的这股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不仅成为国际社会政治论坛和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也成为人们预测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走向和新世纪特点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逆转，使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蒙受了重大挫折，这似乎印证了西方势力津津乐道的“历史终结”和“大失败”断言；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国家的解体与分裂，是以民族矛盾在社会演变中的作用为基础的，这又促使西方预言家作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终将步其后尘的判断。然而，在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西方世界和众多资本主义多民族、多种族国家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宗教纠纷、分离运动却日趋严重，这当然是那些宣扬上述断言和作出上述判断的西方人士始料不及的。毫无疑问，前苏联和东欧地区至今仍是民族主义的裂变场，民族分离、国家分化的过程尚未终止。但是，民族主义浪潮的蔓延所引发的更为广泛的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又使那种试图简单用意识形态分野来评判这一现象的断言难以自圆。

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的广泛兴起及其引起的国家格局变化，无疑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在前苏东地区十分明显。但是，它超越意识形态对立所表现出的普遍性，却更突出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处理和解决民族矛盾方面具有共性的弊端。任何多民族或多种族的国家，不论其实行何种社会制度，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和种族问题，必然将陷入反映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的社会问题困扰，甚至是危及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裂变。

从一战、二战前后的两次民族主义浪潮的表象特征和形式看，国家数量的增多是一个共性特点。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的现实表现也在反映着类似特点，这是否意味着在世纪之交的年代或新世纪的一定阶段世界国家格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一些预言家提出的几百

乃至上千国家的世界国家格局真得会出现吗?在研究民族主义浪潮这一跨世纪现象时,我们不仅需要考虑这些问题,而且更需要从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大背景下来探讨民族主义浪潮的两重性和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当前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汹涌的国际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有多大、有多深,并不取决于西方敌对势力的预言和图谋“分化”的战略,而取决于我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实际成效。内因是变化的依据,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内部的问题解决好,我们就具备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牢固基础和有效抵制外来消极影响的能力。

应当看到,世纪之交世界民族问题的特点,虽然表现为矛盾、冲突和分离的走向;但是,它的深层内涵又预示着人类社会在进入新世纪的过程中,正面临着科学认识民族过程的发展规律和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抉择。在这一选择中,成功的理论与实践必然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借鉴。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将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进程,对世界民族过程产生积极的影响。

20 世纪的三次民族主义浪潮

当旧的基本上是保守的和前民族主义秩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崩离析之时，也正是欧洲采取政治行动的时机成熟之际；它确定了当时所谓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方向——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观念成为政治组织和群众自我认同的基本要素。后来，这一原则还普遍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殖民地后时期。

在前共产党国家里，民族主义的极端分子的势力甚至更为强大，因此，还不能预作结论说激烈的欧洲民族主义的时代已告全面结束。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

20 世纪的人类社会民族过程，出现过三次重大的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它们分别发生于一战、二战和冷战结束前后。

虽然这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泛起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义各不相同，但是作为社会进程与民族过程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性运动，却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内在联系，也因此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一、一战前后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

20 世纪初，欧洲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争夺从巴尔干半岛率先起步，并形成德、意、奥匈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协约的两大帝

国集团对立局面。

1912年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使巴尔干各民族长期反抗奥斯曼帝国奴役统治的斗争取得胜利。但是，由于长期的帝国专制和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巴尔干各民族谋求解放的斗争和建立独立国家的热望，既有反抗土耳其势力的联合，又有各民族之间为建立民族国家的领土争夺，反抗外来压迫与谋求大民族主义国家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并与历史上曾有过的帝国辉煌背景相联系，提出了种种重建帝国再现帝国版图的大民族国家计划，如大塞尔维亚计划、大保加利亚计划、大罗马尼亚计划、大黑山计划、大阿尔巴尼亚计划、大克罗地亚计划、大希腊计划等。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即是巴尔干一些民族为瓜分马其顿进行的争夺。

巴尔干半岛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建立大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为欧洲两大帝国集团争夺巴尔干半岛的角逐提供了渗透、介入的缺口。利用巴尔干各民族由于帝国统治、瓜分、奴役所造成的民族仇怨，鼓励某些大民族主义的扩张热望，也成为沙俄和奥匈帝国直接染指巴尔干的出发点。在帝国集团的争夺下，巴尔干半岛的民族解放运动渗透了大民族主义的毒素和民族复仇的心理。巴尔干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冲突的多发性，使这一地区再次扮演了欧洲“火药桶”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塞尔维亚人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国皇储的枪声拉开了序幕。

一战是欧洲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战争危机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1917年俄国爆发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俄国首先退出了战争。作为“各民族监狱”的沙俄帝国，其彻底覆灭的过程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与资产阶级和沙俄旧势力的较量以及各非俄罗斯民族争取解放的民族自决斗争相交织形势下完成的。1918年到1920年间，在原沙俄帝国版图上出现了70多个共和国或独立政

权，其中除资产阶级和沙俄旧势力负隅顽抗的政权外，大都是以民族为依托并且有过独立国家历史的政权。它们既有苏维埃共和国，又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传统汗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沙俄数百年对外侵略扩张造就的庞大帝国由此瓦解。在列宁创导的民族自决原则鼓舞下，随着俄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第一个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 1922 年底正式建立。

一战以德奥同盟的失败而告终，奥匈帝国也随之解体。中东欧地区曾长期被哈布斯堡、罗曼诺夫、霍亨索伦这些帝国控制的领土上，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涌现了一批民族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但是，新列强的战后分赃和“凡尔赛体制”的构建，不仅没有给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留下自主发展的空间，而且使种族、民族、宗教集团和领土的人为肢解与分割为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内民族关系留下了许多祸患。战后的中东欧地区，有 1600 万人成为脱离民族母体而置于其他民族为主体的国家统治之下的少数民族。这些新建国家在帝国意识的影响下，资产阶级大民族主义的膨胀、民族复仇主义的滋长、领土纠纷的隐患，使其在战后的发展中大都走上了国王专制和法西斯统治的道路。

一战前后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代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反殖反帝进步力量，体现了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自决原则。中国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此外，印度的甘地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阿富汗的塔尔奇民族主义、中东伊斯兰改革主义和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等，都构成了 20 世纪初期东方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精神动力。一战的结束和苏联的建立，使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增加了新的推动力。民族

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相促发、相兼容产生的历史合力，成为摧毁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巨大力量。

二、二战前后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

一战后出现的“凡尔赛体制”并未实现欧洲乃至世界的安定。英、法等列强国家维持均势的企图，一方面受到日益勃兴的海外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挑战，另一方面又受到日本在东方、意大利在欧洲和北非的扩张以及德意志大日耳曼民族复仇主义的潜在威胁。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十分恐惧，对苏联的围困使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分野也随之清晰化。

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欧洲各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德国恢复列强地位的野心在大日耳曼民族主义的社会氛围中，以纳粹的独裁统治取代了魏玛民主制，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开始弥漫欧洲。当时，苏联却在西方经济萧条中取得了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令世界所瞩目。甚至一些西方人也开始相信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苏联的联邦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领导体制。这一变化，使联盟宪法赋予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各自治共和国等自治实体应享有的权利，被大幅度地削弱，甚至在实际中被取消。由此而引起的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情绪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潮，也在1934年底开始的政治大清洗中受到严酷的镇压。列宁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危险的理性认识和他政治遗嘱中要求全党同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决死战的告诫，也从此被束之高阁。对非俄罗斯地方民族主义阶级斗争式的整肃和打击，成为苏联处理民族问题

的主要任务。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和广泛社会基础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因此得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蔓延发展的空间。苏联国内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回升，相应地影响到其对外政策。苏联在支援国际共运和对外输出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开始渗入了大国沙文主义成分。恢复沙俄帝国时期版图的愿望，使苏联领导人在战前和战后都超越意识形态地与欧美列强国家进行了划分势力范围的交易。

德国的重新崛起，使欧洲面临着新的危险。英、法国家以绥靖求和平的愿望，牺牲了小国的利益，刺激了希特勒的胃口。继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吞并、阿尔巴尼亚陷入意大利之手之后，下一个目标是波兰。在这种形势下，苏德之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使瓜分波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在德国以闪电战的攻势入侵波兰，英、法相继对德宣战的同时，苏联红军入侵波兰，并于1940年占领了芬兰的卡累利阿等地、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苏联的西部领土大体恢复了帝俄时期的版图。

二战期间，欧洲国家大都陷于德国法西斯之手。在第三帝国统治之下，边界的变动、领土的分割、民族的驱赶、种族的划分和种族灭绝的屠杀，不仅造成欧洲各国各民族人民深重的苦难，而且也造成以大日耳曼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法西斯主义对欧洲民族主义的深刻影响。尤其在中东欧地区，德国扶植的一些法西斯政权，在民族压迫和种族清洗方面极其残酷。历史上的民族积怨在法西斯式的民族仇杀中肆意渲泄，这些暴行使很多民族之间结下了新的仇怨。

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否认的。苏联红军的战略反攻，使第三帝国迅速走向崩溃。苏联红军在东欧地区的推进，使同盟国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议题首先在英、苏之间达成协议，这就是1944年10月初丘吉尔与斯大林的秘密交易。根据这

一协议，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抵抗力量，在反对复归的流亡政府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英国则以其军事占领的压力解除了希共领导的人民阵线 and 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在希腊问题上，苏联遵守了英国对战后希腊实行何种社会制度拥有 90% 影响力的承诺。当然，这仅仅是大国决定他国命运的开始。

1945 年 2 月 4 日，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克里米亚举行雅尔塔会议。这是战争结束前夕同盟国三巨头勾划欧洲重组蓝图和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会议。除东欧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已明显反映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分野外，美、苏关于战后中国的协议则表现出传统的帝国强权特点。按照协议，战后美国在中国“起领导作用”，支配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承认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古现状并恢复日俄战争后沙俄帝国丧失的在中国东北享有的“权益”。中国作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员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被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瓜分了。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为了取得苏联不支持中共的保证，在日本要求投降和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之际，接受了根据雅尔塔协定派生出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了外蒙古独立，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权，苏联不支持中共并将除旅顺和大连之外的全东北地区交由国民党政府接管。美国对中国的图谋是其帝国主义本质决定的，不难理解；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以支持国际共运为己任，参与世界强权政治的交易，恢复和维护帝俄扩张时期在中国攫取的权益，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历史继承性，在二战以后日益显著地体现出来。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中国(除台湾、香港和澳门外)由此结束了百多年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的历史，雅尔塔协定

关于美、苏在中国的利益划分被抛入历史垃圾堆。1950年，中苏两国签订了平等互利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不仅使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打破了大国强权构筑雅尔塔体制远东藩篱的企图，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战后到6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在亚洲、东欧、拉美的一些国家相继取得革命胜利，并极大地推动了以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为代表的亚非拉各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浪潮推动下，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地几乎全部丧失，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众多的独立国家不断涌现。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在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自决、自主发展的民族主义斗争中，或多或少地吸收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成分，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建国理论。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虽然并未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无产阶级革命方向，而是以民族主义作为旗帜寻求第三种发展道路，但是其要求独立自主、反对霸权的政治取向，却使众多的新独立国家在随之而来的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中结成了第三世界力量。

二战以后，联合国成员国由几十个扩大为100多个。1957年3月，加纳成为前非洲殖民地国家中的第一个联合国成员国，殖民主义时期的种族歧视藩篱由此突破，这对60年代美国黑人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民权革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二战前后的民族主义浪潮使世界的国家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国家的增多使国际关系中民族主义的要求日益强烈，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平等发展的呼声使构建国际社会平等机制的需要在发展中国家中日益迫切。与此同时，民族主义运动并未因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而休止，众多的民族国家事实上无法改变其国家内部的多民族社会结构，国内民